

回忆我的改造生活

李白英 著

群众出版社

回忆我的改造生活

李 白 英

2355/6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1253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971253

回忆我的改造生活

李白英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 8 印张 166 千字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198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191 定价：0.65 元

印数：00001—77000 册

前 言

我本来是一个战犯，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战犯也可以改造，于是乎我有了被留下来改造重新做人的机会，这在我一生中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诚然，剥夺自由，关进监狱，这是任何人不堪设想的事，何况是二十五年，人生有几个二十五年啊！单从这一点来说，回顾一下我二十五年的改造经过，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事了。尤其是，当一个人自以为在其政治生活的进程中，似乎可以“昂首阔步”的时候，要他甘于放下武器，向人民认罪服输，向昨日之我反戈一击，谁能说这是寻常而容易的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检阅一下我是怎样走过战犯改造这条漫长的崎岖而迂迴的历程，这无论对于我自己和对于亲爱的读者来说，都将不会是枉费笔墨了。

读者不论是哪个党派、哪个集团、哪个立场，可以对于我的改造生活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你可能为我庆幸，为我同情，抑或为我寒心，为我惋惜，我都不问，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我必须面向事实，忠于历史。当我执笔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或许可以这样说，这正是我二十五年改造生活中得到的最根本的教训。

我的改造生活是在成都、重庆、抚顺三个地方度过的。我这个回忆录就是顺着这三个阶段，想到可写的就写一段，但将成都、重庆两阶段列为前篇，而将抚顺管理所列为后篇。

目 录

前 言

前 篇

一	乐山去来	3
二	进政训班	10
三	“倒脏水”	12
四	“立场、观点、方法”	24
五	“从第十四条钻出来！”	29
六	第一次劳动课	42
七	决裂	48
八	转移重庆	51
九	参观	56
十	盲目乐观	61
十一	预审	65
十二	清醒过来	70
十三	特赦、前途、教育	79
十四	在黄荆坡上	82
十五	又一次考验	89
十六	写文史资料	92
十七	转移抚顺	96

后 篇

- 十八 到了这个新的地方103
- 十九 接见家属108
- 二十 首都参观113
- 二十一 深入交罪认罪127
- 二十二 “十可亲”142
- 二十三 革命人道主义148
- 二十四 在红色海洋中155
- 二十五 大风暴162
- 二十六 体验、考验、锻炼174
- 二十七 改造“兰开夏”的战斗189
- 二十八 两个不深、三个怀疑197
- 二十九 毕生难忘的日子204
- 三十 回到人民行列210

后 记

前 篇



一 乐山 去 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成都快临解放。一些熟人多已作好逃台准备，只等通知就到新津机场起飞了。我怎么办呢？也想逃台湾，但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和四川省参议会都没有为我准备飞机票。上山吗？省党部正是有这个决定，根据上级指示，指定所有省党部委员、处长等高级骨干在必要时去到灌县或者乐山县参加中统布置的“川西”或“川南办事处”，参与指挥它们在两地集中的特务武装，共同行动，上山打游击，“和共产党拼到底”。这种决定真是活见鬼！一伙头头逃之夭夭，留下我们去拼命，想想共产党就是以游击起家的，几百万大军抵不住，要我们留下“拚到底”！什么“上山”，还是各奔“前程”。

这些日子，熟朋友见面，常是灰溜溜地发苦笑，似乎关心地问答：

“怎么办？”

“你怎么办？”

被问的人常常不作回答，照样反问一句。

“还不是上山嘛！”

这种问答，彼此心里明白，都不是真话，有的人明明是要飞逃了，有的人却是“嘴硬骨头酥”，说说壮胆。

我怎么办呢？

飞不成，留不得，逃那里去？有一天我和一个要好的朋

友，也是省党部委员叫金存良的商量，他劝我到他家乡乐山去暂避，说等共产党来，只要不乱杀人，还有一线生路，就同回成都，万一情况不利，迫不得已，再逃进大小凉山，或者逃去昆明，设法逃出国外。总之是走一步算一步。

我把这个打算告诉妻子儿女，她们拿不出别的主意，只有随我自便。

十一月三十日，听说重庆解放了，蒋介石带着一批高级官员乘飞机到了成都，布置川西残余部队顽抗。

十二月一日下午，我到省党部，指挥宣传处职员把全部文件图书烧毁了。其它秘书处、组训处各部分也都焚毁了全部文卷。干涸的池塘边，东一堆西一堆的纸堆，呛着乌烟，熏着两眼，我面对“树倒猢狲散”的境况，很不是滋味。党部部长漆中权也来了，我十分感慨地向他说：“这一下我们‘应变’的任务彻底完成啦！”他领会我的意思，发出一丝苦笑。随又把我拉到一边耳语说：“总裁表示，若有时间，要安排晚餐接见我们”，接着又说：“要看能不能排出时间”。我立刻想到九月初他到成都在军校的晚餐会见省党部高级骨干的情景，心想：“今天什么都完了，还谈什么！”过不几天我逃离了成都，不知那个会餐有没有。

这一天夜里，我随便吃了晚饭，怀着凄怆的心情，照例又到西御街一家茶楼上喝茶，听清唱。

粉牌上写着当晚唱词叫做“铁冠图”，这名称很怪，是什么内容呢？过去从没听过。我喝茶等着。

“请雅静！”时间到了，“堂倌”（注）喊了一声。只听盲

注：茶社营业服务员。

艺人沉抑婉转的琴声和唱词，把我带到一个悲绝凄厉的天地。原来这个词本内容是描述三百年前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末皇帝朱由检走投无路，煤山上吊的情景。

“宗社孤危日月寒，大明天子困 弹丸……诸臣无能权谋错，已失人心挽救难！”

“望眼穿，望不到外援，调吴三桂入援，迄今不至。看看内城将破，这一座禁城，又如何能守啊！唉！好不急煞朕也……”

“这两班文武啊，……文武到这时一筹莫展，……更兼之武官怕死，文官爱钱，把士大夫的廉耻都丧完，失去了民心天难挽”

“……………”

朱由检在宫中闻外城已破，惶急无计，带着宠臣王承恩奔上万寿山观看形势，遥见四城起火，到处喊杀之声，望救兵不至，呼天不应，眼看国破家亡……。听盲艺人细腻曲折，刻画入微的咏唱和道白，字字扣人心弦，四座寂静无哗，更加深我对国民党和自己日暮途穷、凄凉枪惋，没落悲哀的伤感心情，觉得盲艺人当晚选唱这样一个词本，似乎是有意安排的，好象为听众中我们这一伙面临崩溃的国民党灾官唱一首送终的挽歌一样。

十二月三日中午，我按省党部通知，以主人之一的身份到省党部去参加为随蒋介石到成都的国民党中央高级官员“洗尘”的筵宴，说确切一点，这是一次“分家饭”。

这天席上，主人方面有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前主任委员、现任川大校长黄季陆，书记长漆中权，副书记长兼组训处长许伯超，秘书处长易秋潭，四川内调处处长先大

启等人和我；客人有陈立夫、李惟果、郑彦棻、谷正纲、任卓宣、刘健群、张清源等等，坐满了四席。照样名厨川菜，美酒佳肴，嘻嘻哈哈，吃吃喝喝，只是没有频频举杯。

中宣部长任卓宣和我同席，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这一天，大家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请酒、请菜。到席散前，他要我通知广播电台，安排时间让他去作广播讲话，我立刻要宣传处干事杜味涩打电话通知了广播电台，让任卓宣当晚七时去讲话。他这天晚上讲些什么，我没有收听。他还能讲什么呢？！我不听也知道，反正他立即上飞机逃台湾，这位部长先生可以大摇大摆地说：“四川人民有光荣传统，要和共产党拚到底，我们去了，很快就要反攻大陆，不久就要回来的……”不听还好，听了我会气地把收音机砸碎！

转眼到了十二月六日，金存良通知我，他因家人催促，没等我同行，先动身了。我也对家人再作了一番安排，要她们留意，如果共产党来不随便杀人，对我这样的人有生路可走，即速写信通知我回来。我又到省警局办了一个化名“刘子衡”的“国民身份证”。七日早上天没亮，我诀别了家人，到南门汽车站搭车，当天到了乐山。

我一到乐山就去月呷塘找金存良，他的么叔金安仁接待我说金存良向他交代过，要我住下，金存良因事先下乡去了。交谈之后，才知他是我早年在甲种工科校的同学，多了一重关系，他一向在乐山充任保安团长等职务，在当地颇有地位。我要他用我化名介绍在不拘什么机关作一名小职员，希望就这样在那里隐藏下来。金安仁只是要我安心住下，不要着急。

想不到才过三、四天，那里风声也紧了，听说解放军二野

已经过了宜宾、犍为，快到乐山了。我实在安不下心来，不顾金安仁的劝阻，拿了行李，一路探问，赶到青衣江上游六十里盐溪口集镇找到我另外一个朋友王伯举。他是乐山县救济院院长，我一九四四年主办四川省训团社工训练班时，他是调训学员，由此结识，颇为相契。见我远来相投，全家人都热情地接待我。

就在我离开乐山县城的第二天，乐山就被解放军占领了。从那时起，王伯举不时告诉我，他从集镇上得来的关于解放军入城后的消息，一切平静，没有捉人，没有杀人。不久，救济院派人送来通知，说解放军欢迎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回去，把各部门的工作照样办起来；说乐山县组织了“支前委员会”，他的亲戚某某、某某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很受解放军欢迎。接着又传来消息，说乐山县大办“一九五〇年元旦庆祝胜利大会”，或说是办“军民联欢大会”，本县许多头面人物都已回去。

王伯举和我对于这些消息十分关心，开始时不免狐疑，情况究竟怎样？慢慢有点心动，决心亲自去到县城探明真象。到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我和他家人一起同乘一只小舟，顺流而下，到了县城，住在铜河埡县救济院。

当天我就去找金安仁，金存良也从乡间回来了。这时他才告诉我，他的堂妹——金安仁的大女儿金淑良和妹夫张斐然都是中共党员，多年来在乐山办“新艺书店”，从事地下工作。他说堂妹告知毛主席对国民党人员有宽大政策，不论过去有多大问题，只要真诚坦白自首，向人民交代，都可以得到宽大，不会乱杀人。他说他堂妹这几天事忙，过几天约我当面详谈。

这几天，住在乐山救济院的日子，经常有这个院的职员来会王伯举，谈述乐山解放时的见闻。据说守城的是胡宗南部三三五师，就在这个救济院前面一带城墙上，胡军沿城警戒，在好几处架设机枪，向城下青衣江对岸警戒。解放军几次从对岸乘舟抢渡，都没有成功，没有料到，当解放军不断猛攻青衣江的同时，已经分兵绕道县城东北“老霄顶”入城，此时胡部士兵仍抵死顽抗，解放军分组搜索各处据点，高呼“缴枪不杀”，胡部士兵仍抵死射击，解放军没有还枪。

那些天，我有时也和金存良、金安仁一起到处游逛，街上到处看到布告，说明对国民党人员的政策。更多的是到处看见解放军指战员不论在渡船、在车站、在游览胜地对人民彬彬有礼和市街上秩序那么良好、安静，虽然对共产党宽大政策实际如何还有些疑问，但不乱杀人这一点，看来是真的。

过了三天，金存良约我在他家吃饭，席间介绍认识了他堂妹和妹夫。

饭后交谈，我说：“虽然毛主席有宽大政策，但我的情况严重啊！我不但解放前夕还是现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宣传处长、省参议员，成都解放前夕还在鼓吹抗拒解放，而且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四七年四月我还任过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主持‘六·二大逮捕’，共产党怎能容我啊！”

金淑良说：“宽大政策只问是不是真诚坦白，能不能立功赎罪，不问任过什么职务，罪行多大。共产党政策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对顽固抗拒的人才从严，共产党政策从来毫不含糊，这一点，李先生务必坚决相信！”

我心里将信将疑，信的是金存良的亲堂妹难道也说些好话来骗我死？疑的是实际处理到我头上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问金存良打算怎样？他说：“决定回成都，不过还要耽搁两天才能走，因为家里还有事要办”。

我这时考虑：我到乐山的一切，连我的化名以及我的打算，她们父女叔侄全知道了，乐山是藏不下去了。既然金存良也相信，要回成都，看来我也只有这条路了。于是也决心回成都闯一下，吉凶祸福，听之天命。

过了一天，我搭乘一部私商小汽车回到成都。

刚回到家，妻子儿女们不明政策，见我归来不知如何是好，我自己也没把握，一连几天只在家里躲躲藏藏，不敢上街。直到第五天，我深夜去到三道街好友罗文谟家，探听风声，想不到他一见我就大喜，说我“来得正好！”说他已和李文孚、杨荫池两人约好，明天由杨荫池陪同去前卫街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报到自首，正好同去。

第二天是一月十五日，我如约到罗文谟家，和原特委会秘书李文孚、原特委会审讯组长杨荫池等四人去公安处，见到主管人员杨科长，填了“自首登记表”，迈出了我投靠人民的第一步。

二 进 政 训 班

在公安处报到时，杨科长一见我们就说：“你们来啦，很好。我们很欢迎！”

接着在给我们填写“自首登记表”的时候，他又以惋惜的语气单独对我说：“你不是有一个亲戚叫曾××吗，军统稽查处要抓他，他已逃避，你当时有力量掩护他，而你却劝他自投罗网，要他到稽查处自首，有这个事吗？你这件事做错了，是吗！”

我没有想到共产党把我的问题弄得那么清楚，并且一见面就这样问我，使我既是惊愕，又是惭愧。当时心想，今天既然是我自己来了，只好硬着头皮过去，我答说：“这件事我当时的确是太糊涂，军统稽查处抓曾××，曾××已逃避，我要掩护他是很容易的，但我那时只知道一心为国民党，就劝他去投案，造成大错，想起来万分后悔！”

杨科长听我讲完，似乎为了消除我的疑虑，他又说：“我提起这事，是因为事情过去不久，一见你就想起来，顺便问你，没有别的意思，你不要因此产生顾虑，你要相信政策，只要肯坦白交代，真诚悔过，共产党是不咎既往的，希望你以后好好改造学习，争取重新做人！”

对于杨科长的讲话，特别是他讲的“要好好改造学习，争取重新做人”这个话，我当时既不够理解，也未深思。一心以为向共产党报了到了，自首了，“自首登记表”也填了，

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表示愿意自新了，就算过关了，回到家里就可以一心一意考虑今后生活问题了。

由于我仅有的一点贪污资财，临解放前几乎全被银行钱庄赖了账，手上仅有极少一点现款，眼看坐吃山空。想在新社会谋一职务又毫无门径，就想开一个小店，做点香烟、肥皂……小日杂买卖维持生活。我一面托亲友找店铺，一面就和一、二个熟朋友不时到安乐寺学做投机生意。

不久，过了春节，一个原在省特委会充任干事的旧部属名叫刘远生的来找我，说公安处专为我们报到自首的人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地点在上翔街原二十四军刘师长公馆内，通知我在三月一日以前搬去参加学习。

这时我才忆起杨科长说的“要好好改造学习”那个话不是空说的。我去问一些同样报到自首的熟人，有的说也得到通知，打算如期搬去，有些人则没有接到通知。

对于这件事，我开始颇为犹豫。一方面觉得参加了这个学习，将使我取得共产党派任一个职务的资格。而犹豫的是，这样一来，开店铺做生意的计划搞不成了，日子长了，一家人生活成问题。

考虑的结果，想到自己的身份、历史，警觉到自己丝毫没有游移的余地。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我背起被褥行李进了政训班。